

伟大的

中国新金融 变革史

洪佶馨 董云峰 —— 著

The Great
Adventure

光荣与梦想，野蛮与失控
一场冲破旧秩序的伟大叛逆
也是迈向新大陆的无尽探险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伟大的叛逆

中国新金融 变革史

洪佑馨 董云峰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叛逆”：中国新金融变革史 / 洪偲馨，董云峰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1

ISBN 978-7-308-20714-0

I. ①伟… II. ①洪… ②董… III. ①金融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8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206948号

伟大的“叛逆”：中国新金融变革史

洪偲馨 董云峰 著

策 划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曲 静
责任校对 杨 茜 张 睿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335千
版 印 次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714-0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自1985年由五道口研究生院毕业进入央行，我在金融行业已经度过了35个年头。这期间，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中国银联，之后到证券公司，从宏观政策研究，到微观金融实务，我经历了不同的金融生态。

放在历史的长河里，35年不过是短暂一瞬，但于中国而言，这些年仅仅在金融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已经不是沧海桑田所能形容。遥想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金融业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金融电子化刚刚起步，金融普及程度和金融业务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而得益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对信息技术的积极应用，如今我国金融业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大型金融机构的排名进入世界前列，移动支付与金融科技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这一代的金融人是幸运的，在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基调的时代里，我们能够亲历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密集地见证金融领域许多新生事物，甚至一些重大金融事件的产生。如同本书作者所言，“我们有幸经历了历史的拐点，在很短的时间内见证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

读史使人明智。更多的记录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一直以来，我都期待能有更多人出来记录当代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我也一直认为，当代金融领域之所以能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其重要推手无疑来自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和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诸如商业银行如何从传统的信贷机构演变为无所不能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企业，迈向全能银行的通途；电子支付的兴起，如何迅速地以无所不在的移动支付，历史性地改变人们现金购物的行为方式；信用卡如何从边缘业务变成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等等。当下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提供标准API接口，从而转型为多维度的金融服务开放平台；货币、支付、金融以物联网和区块链底层内置功能的方式，嵌入数字经济各个行业的经营模式之中，使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融为一体，从而进一步模糊金融与科技、金融与电商的边界，甚至可能重新定义金融与金融机构。

我手上拿到的这部书稿，主要记录的是2013年之后中国新金融的发展历程，围绕业务创新、市场格局和监管变化，覆盖了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数字货币、信用卡、大数据风控等领域，涉及当代新金融潮起潮落的方方面面，并且将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以及新兴创业公司的快速演变，置于同一个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为我们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金融变局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角。

令人欣慰的是，两位年轻的80后作者，对历史、对传统、对当代的金融创新变革现实，有着足够的兴趣、激情和敬意。他们既肯定了2013年以来以科技驱动的新金融变革与创新，又看到了2013年之前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所取得的进步之于当下的意义，没有将二者割裂乃至对立开来。历史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而金融创新也好，社会变革也罢，往往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两位作者都出身财经类记者，他们以记者的纪实视角和财经媒体的写作方式，观察、记录新时代的金融变迁，这当然区别于金融史学家注重求证的

学术研究方式及其金融史学专著。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出与时代同步的全景式记录，这本身就将成为珍贵的金融历史文献资料，或许这正是他们书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

谈及新金融，就不能不提到互联网金融，这两个概念本身相差不大，数字化时代的新金融已经很难脱离互联网而独立存在。而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的正式形成，始于2012年8月，在当时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的内部研讨会上，谢平发表了那份关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开创性研究报告。彼时我有幸作为两个点评嘉宾之一发言，我点评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改变现代商业文明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改变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未来的金融大潮谁来主导？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沿着这个问题，我在2013年出版的《金融e时代》一书中，表达了对数字化时代金融新趋势的思考与预见。值得庆幸的是，回过头看，我在那本书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如今并没有过时，而两位年轻作者对新金融兴起以来的发展回顾，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逻辑展望的现实印证。

是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对金融的持续影响真实地经历了三大阶段：初期，科技作为工具推进银行业务处理效率的提升；中期，科技推动金融机构服务和产品的创新；如今，由科技催生的新金融普遍兴起，传统金融全面变革。

这本书的如实记录，也印证了我早前坚持的另一观点：科技可以驱动金融创新，但金融不可能被科技所替代，会被市场淘汰的是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机构。

的确，信息行业和金融行业本质上是“同源”的，它们有着相同的“数字”基因，这两个最有生机和活力的行业从而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同源”还意味着金融与科技的互动、融合，但金融归金融、科技归科技，二者依然各有天地。

关于我所提出的网络时代金融业“得账户者得天下”之说，这本书所呈现的不少发展案例，都在反复印证账户在数字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账户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归宿，谁拥有了客户账户，谁也就掌握了客户资源和业务基础。过去几年里，一些互联网公司以第三方支付为起点，已经在这场账户的争夺中取得了重大优势，也一度令主流金融机构倍感压力。如今，这些

金融新业态的业务已经从数字金融走向更广阔的生活服务，而这一切的基石正是账户。

诚然，作为新金融时代的亲历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重温两位作者所记录的许多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鲜活事件，每件都历历在目，成功者拓展了新金融的展业空间，失败者则令人感慨良多。

零售金融是中国金融业近20年来最为生机勃勃的领域，也是这本书着墨甚多的一个部分。我一直相信，信息技术赋予了零售金融更多生机、活力和灵气，推动零售业务实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逆袭，已经使它由商业银行边缘化的配角成长为长袖善舞的主角。

柯达、诺基亚等昔日巨人由盛转衰的故事，似乎已成为商学院逢课必讲的经典案例。是的，它们曾经何其强盛，但一旦落后于时代大潮，就会被市场毫不留情地淘汰；反过来，我们看到松下、苹果等公司，它们初创时也曾渺小低微，却因以创新引领需求而蓬勃绽放，这是顺从市场法则的天道酬勤。

如今，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而工行、招行等老牌商业银行同样通过变革创新变得更加强大，未来它们之间的竞争与碰撞会更加精彩。至于最终的结果，我依然相信，谁能够顺势而为、勇于创新，谁就能拥有未来。



招商银行前常务副行长
中国银联首任董事长兼总裁
国泰君安证券前董事长

目
录

2013年
以前

一 引子

附：新金融创世记 /012

二 前夜：一个国家的起飞

膨胀年代 /019

草根金融之春 /025

万物归“移” /033

2013—
2015年

三 元年的诞生

余额宝奇迹 /046

比特币惊雷 /052

互联网金融元年 /060

附：互联网金融大事记 /067

四 支付战争

支付进化 /074

意外开局 /081

双雄时代 /089

2015—
2017 年

五 P2P 浮生若梦

P2P 狂潮 /100

大厦崩塌 /108

一声叹息 /114

六 变脸与和解

整治风暴 /122

央行图治 /128

和解年代 /133

七 消金风云

消金溯源 /146

风起校园 /149

巨头蜂拥 /152

现金贷狂欢 /154

助贷上位 /157

附：中国消费金融大事记 /164

八 IPO 悲喜录

大幕开启 /168

资本盛宴 /175

趣店风暴 /181

附：新金融公司融资及IPO 大事记 /189

2018 年 至今

九 大象之舞

王者归来 /194

新物种奇袭 /200

另一种可能 /205

番外：中国信用卡大革命 /211

十 往何处去

BigTech：世纪性监管难题 /238

数据行业覆灭记 /243

催收行业何去何从 /250

十一 时间的玫瑰

数字货币新时代 /260

网络互助兴起 /269

基金投顾探路 /276

小微金融进击 /281

奔腾吧，金融云 /289

后记：致一场伟大的“叛逆”

第一章

引子

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一代人努力缔造的金融科技传奇，终究还是成为下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环境。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接受的残酷。没有人永远屹立潮头，但总有人正乘风破浪。

1991年初冬，美国人伊瑟尔·森卓维克，从纽约，经旧金山、香港、天津，一路辗转到了北京。

那时纽约到北京还没有直飞的航班。森卓维克在2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北京之旅：

“北京机场很小，和我想象中中国首都机场应有的规模相去甚远。央行派人接机，进京的道路为双向两车道，路上几乎没有民用车辆。倒是有不少卡车、自行车和驴车。出租车很少。进京途中，路边堆着小山高的大白菜。看来正值收获季节，北京市民少不得要冬储大白菜。”^①

森卓维克的身份是纽约联储银行执行副总裁，作为美联储代表，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加入国际顾问专家组（IAP），支持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① 沈联涛，《金融、发展和改革》，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

(CNAPS)的开发建设。

CNAPS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项目，是为商业银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支付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的系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支付系统。

在当时，中国的支付系统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以同城现金交易和低效的跨行异地直面交易为主，异地支付的结算能拖上 30 天，大笔资金要被冻结待结算。

直到 1990 年年底，整个金融系统已安装的大中型电子计算机仅有 130 余台，小型机及超级微机 1600 余台，ATM 不过 400 余台——当时美国银行业 ATM 总数超过 8 万台。^①

那时候银行柜台大多还处于手工阶段，除了算盘和钢笔，就是成堆的账本；在券商营业部，堆满了人工来不及处理的股票交易单据，要等交易所收市后逐笔汇总对账结算，动辄要忙到午夜。

相形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的实时结算。诸如美联储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 Fedwire 早在 1970 年就实施了，德国和日本的系统分别于 1987 年、1988 年实施，英国和中国香港的系统也在 1996 年实现了落地。

没有现代化的支付系统，就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无法真正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央行着手设计新的支付体系。

与森卓维克一同加入的专家组成员，来自英格兰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日本银行和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他们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时全额结算系统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专家组主席是时任央行副行长的陈元。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是 CNAPS 项目中方人员和国际专家之间的重要纽带。包括 CNAPS 在内的中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则贯穿了陈元在央行任职的 10 年，也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992 年，在引入世界银行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之后，央行正式启动 CNAPS 项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行每年对中国的援助贷款高达数十亿美元。

世行方面负责该项目的是金融发展部高级经理沈联涛，他在项目启动不久后赴港，先后出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香港证监会主席，后来还成了中国银监

^① 陈天晴，《中国金融科技：三十年前》，中治研 <https://mp.weixin.qq.com/s/bjVl9rr9xhJEZmQuA-JmVw>。

会（后与保监会整合为银保监会）^①首席顾问。沈联涛是马来西亚人，父亲沈芷人是一名传奇华商，早年与邓小平等同批赴法留学。

1994年，央行就CNAPS的建设实施进行国际招标，最终，中标方为日本NTT DATA公司，而项目的建设直到1996年才动工。

为加快脚步，2000年年底，央行改变战略，决定“调整定位、借鉴吸收、完善需求、以我为主，加快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

此后，大、小额支付系统的项目承接方换成了国内的一家软件公司，央行清算总中心则派技术人员全程参与，学习掌握支付系统的设计开发方法和经验。

2002年10月8日，大额支付系统成功建成上线，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时代的来临；此后清算总中心又相继建成了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它们所构成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奠定了后来中国移动支付以及金融科技引领全球的基石。

二

当代中国的金融科技建设，不可能绕开央行金电系统。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核算工厂，其业务是从事全国手工联行对账工作。

1970年，核算工厂一度迁至四川省旺苍县，直到1975年迁回北京，也是从那一年起，央行在北京、上海等地同时启动了“全国大中城市银行核算试验工程”。

在20世纪80年代初，银行业开始了联机实时处理的尝试，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条街的6家储蓄所进行联网。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来自国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和技术，逐渐被大规模引进、吸收和推广。

1984年，央行将核算工厂改为电子计算中心。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1988年8月，央行宣布成立中国金融电脑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主要任务是从事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化项目的

^①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保监会”，一行三会变为一行两会。正文为避免误解，还是统一称银监会。

规划、建设、管理、协调工作。

建立现代化的支付系统，需要依托现代化的通信网络，指望地面通信线路解决金融系统的全国联网问题并不现实。1989年5月，中央批准人民银行建设中国金融卫星通信网。

这一任务落在了1990年5月成立的央行清算总中心肩上，同时推进的还有电子联行系统。

全国金融卫星通信网以北京沙河为主站，在全国各地建设小站。如今的清算总中心主任贝劲松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当时主站周围都是农田，交通很不便利，需步行3公里才能搭乘公交车到城里。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只能在沙河单位食堂用餐，睡在集体宿舍。建设卫星小站的任务更加艰巨，建站技术人员要转战全国各地，不分春夏寒暑，拿着罗盘、带着频谱仪，到达目的地后马上架天线、找卫星、调试室内单元，效率最高时一天可建一个卫星小站。”^①

1990年6月，央行将中国金融电脑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金电公司由此而来，原电子计算中心则被成建制并入。

金电公司独揽全局的情形没有持续多久。1991年，央行决定成立科技司，剥离金电公司的政府职能；之后又将清算总中心剥离了出去。

从此，金电公司主要承担电子化项目建设与实施、电子化资金管理等职能；清算总中心则专门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

科技司最初的名字是金融科技司，筹备组负责人叫印甫盛，他还是首任清算总中心主任，此前则担任金电公司总经理助理。

印甫盛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早年曾在辽宁省朝阳柴油机厂做技术员，在1984年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公司，也是新浪网（四通利方）的源头。

1992年，在央行金融科技司的努力下，金融科技进步奖被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系列；当年10月，金融科技司召开了中国金融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太平洋对岸，1992年，美国参议员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正式推出跨世纪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俗称“信息高速公路”战略。

中国决策层同样对新兴技术表现出了极高的重视度。1993年6月1日，

^① 贝劲松，《科技队伍助力支付清算行稳致远》，《中国金融》，2018年12月。

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来到央行清算总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发表了《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讲话。陪同考察的陈元在多年后回忆道：

“他把金融支付发展政策摆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提出构建非现金支付体系、大力发展银行卡、建设全国统一的银行卡市场等设想。他指出，金融电子化是实现我国金融管理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有利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最大阻力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不统一。”^①

这次考察之后没过几天，刚刚挂牌重组的电子工业部召开全国电子工业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在全国组织实施涉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金桥、金卡和金关工程，即中国金融科技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三金工程”。

其中，金卡工程是一场涉及各类卡基应用的社会信息系统工程，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跨系统、跨地区、跨世纪的电子货币系统，在当时全国400个城市基本普及金融卡的应用。它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银行卡的跨行联网通用，并为后来银联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三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993年年初的中国。当央行的金电系统以北京为大本营披荆斩棘之时，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同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金融科技热潮。

当时，刚刚履新招商银行副行长不久的万建华，有一天饭后散步，在蛇口商业大街看到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ATM（自动取款机），却惊奇地发现ATM显示屏上蒙着厚重的灰尘，银行卡插卡口则挂着零星的蛛丝。

这一幕给万建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后来出版的《金融e时代》一书中写道：

“它独立一隅，基本上沦为一个尴尬的摆设。作为银行管理人员，我们在心里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究竟会有多少人使用这个‘自动’的‘取钱机器’呢？”^②

在创办银联之前，万建华在招行工作了8年，是招行早期金融科技战略的

^① 陈元，《重温江泽民同志〈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有感》，《人民日报》，2013年4月11日。

^② 万建华，《金融e时代》，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